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2.021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应对经费问题研究

戴利朝,李时民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革命组织的有效运转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经费不足问题,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发展的始终。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革命事业的发展、经费开支的增加,加之中央拨款削减,地方党组织时常面临经费不足的窘境。为此,江西地方党组织多措并举,努力开源节流。其具体方式为:一方面通过争取拨款、党员职业化、党费征缴、组织募捐、个人自筹等方式,从多个渠道开掘经费来源;另一方面,采取精简组织、减少会议开支、管控地方预算、遏制浪费贪污等手法,多方节省经费开支。这些举措,总体上有助于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助推了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共江西地方组织;革命经费;开源;节流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2-0163-08

在影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革命发展的众多因素中,经费至关重要,直接关乎党组织的面貌、运行及其功能的发挥。假如忽视了革命经费这个要素,恐怕党组织的真实面貌和运行实际就会模糊或受到遮蔽。对于党的革命经费问题,学界的研究总体上并不充分^①,且大量的论文只涉及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各省级党组织等整体或上层组织的经费状况,鲜有研究成果以地方党组织为对象。为此,本文尝试以江西为对象,专门分析地方党组织^②应对经费问题的努力和举措,以揭示经费对党的革命事业及其进程产生的多重影响。笔者期待,本文能有助于揭示各级党组织围绕革命经费问题展开的互动机制,进而呈现革命历史复杂而艰巨的一面。

一 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经费问题的由来

江西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地带,有着“革命摇篮”的美誉。在广袤的赣鄱大地上,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创建与发展颇为曲折。1921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在萍乡安源煤矿成立,次年2月建立党组织,党团组织均隶属湖南支部。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在南昌成立,这是江西第一个团组织。大致上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江西地方党组织发展处于秘密而缓慢的状态。此后,江西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实现了蓬勃发展。1924年5月南昌支部成立,1925年7月九江党小组成立,1926年1月吉安党小组成立,同年4月中共江西地委成立,下辖3个支部,共有党员65人,且很大

收稿日期:2023-1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AD204)

作者简介:戴利朝(1974—),男,江西泰和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①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何益忠:《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活动经费来源及影响》,《史林》2010年第6期;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王盛泽:《福建白区党组织的经费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苏区研究》2018年第4期;刘宗灵:《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经费问题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6期;等等。

^②本文所指的地方党组织,主要是指省级及以下各级党组织。在早期,由于党团合一,经费实际难以区分,故将早期团组织的经费纳入其中。

一部分是由团员转化过来的。到1927年4月,全省共有党员3000人,除萍乡和寻乌两县外,有56个县建立了党小组,14个县虽未建立党小组,但有党员活动^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党组织遭受了巨大损失,转入地下,大量党员去往乡村。中共江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多次被摧毁,又多次重建。例如,1929年11月23日,省委机关及其下属的部分组织第三次遭到国民党破坏,省委领导、党团员及革命群众300余人被杀害;1930年3月,省委在九江重建,5月下旬第四次遭到破坏,省委领导、党团员40余人就义;1931年下半年,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成立,与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等的省委共同领导江西各苏区及其周边苏区的革命斗争^②。

地方党组织的曲折发展和革命形势的转变不无关联,但也受到了经费问题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经济困窘的境况,贯穿江西地方党组织从创建到土地革命时期发展的始终。就党团组织内部来说,经费短缺,生活艰苦,很多同志不愿做党内工作,和平享乐、贪污腐化严重^③。早期也出现团员无力缴团费而退团的情况^④,以及团组织的关键人物因组织让其放弃谋生的职业,专职从事团务工作,而宁愿退出^⑤。这些无疑都对党团组织运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和其他各省一样,早期江西党组织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中共中央拨款。仅从双方报告或书信往来就可以发现,江西省委多次与中央就经费问题展开沟通,或求援或抱怨,这些材料显现了地方党组织面临的经费窘境。例如,1928年2月,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需要4000元来应急^⑥;同年3月中央决定停止拨发江西经费,省委妥协,希望中央

暂时发放两个月经费,以应困局^⑦;同年5月省委希望中央重视江西工作,至少需5000元拨款来接济^⑧。然而,中央实际上并未拨款,加之从1928年1月到7月江西党组织机关被抓获,损失2000余元经费^⑨。这让省委感到气愤不已,12月又向中央索要经费800元,甚至以解散江西党组织为威胁^⑩。1928年11月中央承诺给江西拨款600元,到1929年6月却还未寄到^⑪。1929年1月,省委给中央的预算表上显示所需总金额为2773元,但实际上仅从中央得到750元经费^⑫。当年6月的报告显示,除赣西南、信江、九江经费可以自给外,江西其余地方的组织仍需要津贴^⑬。即便如此,同年8月,省委的决算经费由1800元减至900余元^⑭。

历史地看,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江西党组织经费虽然不充裕,但并未成为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江西各地革命暴动的兴起和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929年共产国际对华援助政策的突变^⑮,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共中央下拨经费的削减,使江西各地党组织本不充裕的经费日趋“断炊”,进而影响到组织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革命经费问题越来越成为党组织面临的紧迫课题。

二 开源:江西地方党组织筹措经费的主要方式

从事实来看,地方党组织面对经费不足问题并没有“洗颈就戮”,而是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纾困。尤其是1929年,中共中央大量减少了对各省的拨款,江西党组织开始大量自筹经费。1929年

①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2—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②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173页。

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④《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⑤《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185页。

⑦《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193页。

⑧《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226—227页。

⑨《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264页。

⑩《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15页。

⑪《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31—232页。

⑫《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5页。

⑬《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48页。

⑭《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⑮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

1月19日,省委发出《中共江西省委赤字通告(第五号)——关于党的经费、人才问题》的文件,提出开源节流,即党员职业化、去雇佣化,党员缴费。两个月之后的3月27日,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针对江西党组织经费短缺的问题提出了和江西省委相似的要求,并决定以后不增加江西党组织的经费^①。但是,政策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面对要求,地方党组织还是会习惯性地提出经费申请。如在1月19日通告发出不久后的2月17日,地方党组织还是一如既往地向省委申请甚至索取经费^②。对此,当年6月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如此表述:“全省的经济独立基础,已有计划,但各地尚未迅速执行,故目前尚须中央接济。”^③换言之,江西省委虽然已经计划“经济独立”,但由于各地还未迅速落实,仍然向中央争取经费,并希望延缓自身“经济独立”的期限。

除了向上争取经费外,地方党组织首先强调“党员职业化”。这主要是指,党员利用社会关系,找到一份固定职业,通过职业劳动换取工资报酬或赚取经费,来维持或充实党组织的经费。这方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要求,如在1928年10月指出:“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④从现实来看,很多地方党员不事生产,“职业化”并未实现。“有一部分支部书记或者是政府的委员自己觉得特别高人一等,不参加生产,在北路为甚,已加以严重的纠正。”^⑤而“东北特委差不多三四个月,负责同志都是在外揩油作工。”^⑥还如九江县委,“县委组织是

健全的,但五个常委都脱离了生产,不能深入群众中去,犯了形式主义的倾向,省委已有指示去纠正。”^⑦党员职业化并非完全是响应中央号召,也有出于自发性的考虑。如早在1927年10月万安暴动前,许大权在担任中共万安县罗圻区委书记的同时,其职业是开设油行^⑧,所以,他能一次支出200元给想回家的士兵作旅费^⑨。党员如果拥有一份相对固定的职业,既可以赚取经费,又可以掩护革命身份。如万安县党员湛光重开了一家药铺,以卖药治病为名建立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点^⑩。1929年在江西党组织被国民党大面积破获的情况下,领导人冯任提出的善后意见就有一条:“调赣西特委书记王百元及区书记彭胖子来南昌,参加省委及南昌市区工作,他们可各把一二十元,做提蓝子的小生意。”^⑪当然,从广义上看,职业化不一定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也可以是临时性兼职,或主动参与生产,创造收入。至于党员职业化的程度,省委对于地方县委有时也会有量的规定。如1929年省委给九江县委的目标是,至少要做到半数县委成员不领党的生活费^⑫。省委经常在和地方通信或通告中提出要求,予以督促,强调党员职业化是为了改善自身经费困难的境况,又是服务于革命,因而不能只顾职业而忽略了革命,又不能单纯只顾革命而脱离生产。土地革命后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过度的党员职业化。例如,不少党员改变原来的职业转而从商,甚至放弃组织工作不做而去经商,发生了一些贪腐案件。为此,中共湘赣苏区省委于1934年3月11日颁布《对于党员与苏维埃工作人员私自经商图利的决议》^⑬,严禁党员经商。

其次是征缴党费。向党员征收党费是党一贯的要求,缴纳党费也是党员应尽的一项义务。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42页。

③《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32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页。

⑤《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256页。

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278页。

⑦《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06页。

⑧“潞田油行:潞田高坑人许申甫,许大权开设,民国初年至解放时止,独家经营。”参见:《万安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98页。

⑨《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88年印,第116页。

⑩《中华著名烈士(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8页。

⑪《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271页。

⑫《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183页。

⑬刘禄山:《重读七十七年前中共中央禁止党政干部私自经商图利的〈决议〉》,《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1922年的党章就规定,党员有缴纳党费的义务,“欠缴党费三个月”甚至可以被开除^①。地方党组织之所以把党费征缴作为一项“开源”的举措,是因为缴费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如1926年团九江地委“各同志应缴三十四人,实缴者二十人,款由地委支用。”^②由于党组织秘密活动、交通失联等各种原因,有的党员甚至从未缴过党费^③。1929年3月,南昌5个支部只有1个混合支部能缴费,九江、景德镇、赣南、赣西的支部,能缴费的只有景德镇支部,人数不过90人^④。同年7月的一份文件显示,“景德镇的党的工作较好……同志都能开会、缴费、讨论工作等等,为江西工作最好的地方”^⑤。同年8月,省委农委书记沈建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言,南昌市区的3个支部只有1个可以缴费,近郊的10个支部只有3个能确定缴费^⑥。到1930年8月江西党团组织缴费依旧困难,延期情况多有发生^⑦。甚至有党员面对党组织催要党费时还给出“我不向你要求已经好,你还要剥削我吗?”^⑧的回答。实际上,各地的党费征收方式和数目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如缴费数目,1926年4月5日,团吉安地委在联席会上报告:“纳费:工人五十文,学生一百文。”^⑨有的地方为了增加党费这块收入,党组织吸纳一些农民入党,党费从数元到10元不等^⑩。在赣南地区,革命老同志回忆时提到,“每月交党费6—8

个铜板(或五分票子)”^⑪。1929年,省委统一规定,“按期缴收同志的党费,工农分子每月三枚到五枚,知识分子每月一角到两角,但失业的及有特殊情况的由支部斟酌免缴”^⑫。从文献史料来看,省委组织几乎每次会议或报告都有讨论“纳费”(即征收党费)这一项,且多次强调要求党员严格缴费。从规模上看,由于党员人数增加,党费征收增加了一项保障。江西党团员人口数量庞大,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北伐期间为中共党员发展的黄金阶段,江西党员从北伐前的105人发展到1926年12月的800—900人。1927年4月,党员更是达到3000余人^⑬。截至1928年1月,全省党员4000人左右^⑭,12月达到5000人^⑮。1931年12月,全省党员近15000人^⑯。因此,党员人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党组织的党费收入。

再次是举办组织募捐活动。党内有党捐,包含特别捐、自由捐助等捐款活动。党捐用于填补经费亏空或为特殊情况募集经费,甚至在个别地区会由献助演变为强制摊派的“税收”,由党内扩展到党外。党外募捐形式更加多样,如1929年赣西特委向下属特支大队“函知一大队特支火急设法,募捐两百文拿来,专门建立机构之用”^⑰。在无法通过打土豪筹措经费的地方,偶尔也会通过工农革命团体募捐的方式获取经费^⑱。还有就是救济捐款,“救济被难战士,亦要尽量约由群众的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21页。

③《于都、博生、胜利县老苏区革命同志叙述革命斗争经过的材料》,江西省党史研究室藏(内部资料);全宗号、目录号与案卷号:014-1-102。

④《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72—77页。

⑤《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45—49页。

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97—100页。

⑦《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14页。

⑧《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75页。

⑨《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90页。

⑩《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250页。

⑪《于都、博生、胜利县老苏区革命同志叙述革命斗争经过的材料》,江西省党史研究室藏(内部资料),全宗号、目录号与案卷号:014-1-102。

⑫《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47页。

⑬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2—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⑭《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187页。

⑮《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16页。

⑯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2—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⑰《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29—30页。

⑱《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19页。

捐款来救济”^①。为了募捐,还设置了募捐委员会,“经费方面尽量设法,自开办以来已组募捐委员会,到各地募捐,不过成绩如何,尚难预料”^②。偶尔工人罢工过河的经费也会举行募捐,1929年端午节前后,景德镇瓷业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过河之经费,由募捐而成的得三百余元”,在此过程中,“党负责人当时亦过了河去相助鼓励宣传”^③。通过募捐委员会等有组织地开展募捐,地方党组织增加了一项经费来源。

最后是党员个人筹措或捐献。江西早期党员大多为知识分子,且家境优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革命暴动等活动时为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撑。揆诸史料,相关事例不胜枚举,此处仅以万安县曾天宇为例展开分析。曾天宇父亲曾秀升担任过县商会会长,是本地有名的商业资本家兼地主,不仅在县城和罗塘墟有店铺,在家乡还有 100 多亩田地。曾天宇二哥曾振五,在 1919—1922 年担任江西省议会议员^④。1924 年创办于南昌的明星书店、黎明中学,同属一个党支部,书记正是曾天宇。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早期江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其创办的经济基础与曾天宇及其家族广阔的人脉息息相关^⑤。不仅如此,万安革命活动得以开展,更是得益于曾天宇家族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地缘人脉关系。1927 年 6 月曾天宇回到万安后,罗塘至善小学成为万安县域革命活动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及掩护革命活动,他和张世熙、张世纲、文章、刘光万一起筹集银元 800 元,以“办教育、兴民团”的名义在万安县城创办了书店,暗中推销带有马克思思想的书籍^⑥。同年 11 月 25 日,万安农军百余人在曾天宇的家乡罗塘湾村背村集合,农军和革命同志无偿在曾天宇家吃饭^⑦。曾天宇很早就认识到军事武装是农民暴动的天花板,农民暴动的成败与军事武装的强弱息息相关。万安暴动前,他用教育厅督学工资买了长枪、短枪

10 多支^⑧。像曾天宇一样,不少党员及其家族为革命慷慨解囊,甚至毁家纾难,成为当地党组织创建和革命发展的经济支撑。

此外,进入苏区时期,地方党组织在经费来源上更加依赖“打土豪”。如 1930 年 4 月,赣西南特委提出:“在赤色区域阶级斗争剧烈,交通断绝,经济难免发生恐慌。党对经济应采取辟源节流的政策,扩大赤色区线,彻底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防止剪刀现象节省用途。”^⑨同年 6 月,仁仙区委提出:“我们对经济策略要采取(开源节流)一面彻底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一面节省用途,同时经济流通不要部落的封锁。”^⑩到了后期,打土豪出现困境,如湘赣边苏区“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需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去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⑪。实际上,打土豪夯实了地方党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三 节流:江西地方党组织节省经费开支的主要做法

开源只是江西各级党组织应对经费拮据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节流。

首先是精简组织与精密分工。江西各级党组织存在部门中非任事机构太多,精干的人员较少的问题。如此一来,不但空耗经费,而且不利于党组织的有效运转。为此,党组织提出精简组织人员与精密分工的办法。如 1929 年 6 月,省委要求赣西特委:“特委机关建立集体的指导和精密的分工,不要弄成形式主义,在工作还没有做起来的时候,机关庞大起来了,工作人员增加起来了,以为一定要这么多机关,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多经费,才可以应付目前工作计划的布置,结果必致不

①《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7 年印,第 164 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7 年印,第 189 页。

③《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07 页。

④《江西党史资料(第 5 辑)》,内部资料,1988 年印,第 160 页。

⑤《江西党史资料(第 29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14 页。

⑥《万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内部资料,1988 年印,第 14 页。

⑦《万安文史资料(第 6 辑)》,内部资料,1990 年印,第 4 页。

⑧《江西党史资料(第 5 辑)》,内部资料,1988 年印,第 114 页。

⑨《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115 页。

⑩《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12—213 页。

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6 页。

是特委本身目前可能解决的困难多起来了,而妨碍初步工作之进行”^①;同时又要求赣南特委,“你们要过细审核特委本身的人才能力,在目前可售的范围内极力做到集体指导和适当分工……兵贵精不贵多,如果一国之公意志分歧,人多反妨碍组织和工作”^②。集体领导与科学分工,本来是组织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党组织的考量中,亦成为减少经费开支的重要途径。交通站是党组织之间沟通联系的平台,其建设耗费巨大,出于节省经济开支的考虑,省互济总会提出,“一切的机关要建筑在忠实的会员家里,少建筑一些用佃钱的机关”^③,甚至提出党团组织合并办公^④。从效果来看,精简组织及其人员,同时起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约经费开支的作用。

其次是减少会议开支。会议多且花费大,成为党团组织运行的一个特点。如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上”^⑤。1923年10月至1925年1月,团湖南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达89次^⑥。1928年3月,江西省委开扩大会议,预算经费总额达300元^⑦。同年12月的报告显示,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支出费用总额为694元^⑧。对比前文提及的省委每月获取的中央拨款而言,这笔开支无疑金额巨大。由于政策靠会议来上传下达,减少会议次数事实上很难做到,但可以通过适当减少会议人数和时间,来减少开支。1928年8月,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谈及即将召开的本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代表会原定为三十多人,但省委现已决定减少。但将来出席代表至少将在二十人以上,可依中央规期间

开会,开会期间不能超过三天”^⑨。

再次是严格审核地方预算并管控组织运行经费。1929年6月,赣南特委经费预算超过省委全省工作的经费预算,且超过各特委预算的3倍。省委认为,即便这些经费来自特委的自筹自给,也是“浪用”,因而对其提出批评^⑩。同年8月,赣西特委要求下属党组织注重节俭,建立机关除特别费外不能超过300元^⑪。1932年,闽粤赣省委对各区县委作出严格规定:“区委小的二十五元,大的三十元中心区委而要增加,必须做出详细预算,报告省委批准。县委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应尽量节省到一百二十元以下的数目。”^⑫闽粤赣省委还具体要求,其管理下的各党部负责人的伙食费削减至一天1角5分,党组织成员开会等活动须自备伙食费^⑬。1929年5月20日,省委在给九江县委的指示信中要求:“绝对不能津贴,还要你们设法供给省委,这个月的五十元系暂时借去,希望你们迅速筹还。”^⑭这意味着,省委对地方的经费支持,实际上是借款,地方将来须还款。虽然地方不一定能够偿还,但在预算和开销时会更加节制。

此外,遏制贪污、赌博以及反对“金钱革命”也起到了节流作用。有时为了节流,反对转嫁经费,由中央派遣到江西的特派员,经费应由中央拨发,而不是依靠江西地方党部支付^⑮。当九江县纱厂支部屡次向党组织要挟并索要津贴生活费时,县委书记华鄂阳为抵制此种“金钱革命”论,甚至考虑解散支部^⑯。对贪污40元的党员洪汉先,开除党籍,派往游击队工作^⑰。在江西苏区,这些举措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如预算决算制度开始建立了,贪污腐败的现象经过严厉的惩办

①《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92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59页。

③《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164页。

④《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年印,第224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三)》,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1985年印,第33页。

⑦《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193页。

⑧《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21页。

⑨《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303页。

⑩《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58页。

⑪《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69页。

⑫《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年印,第33页。

⑬《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年印,第224页。

⑭《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184页。

⑮《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34页。

⑯《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56页。

⑰《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7年印,第242页。

措施有所改观,保证了党的经费^①。

四 革命经费短缺对江西地方党组织的不利影响

从土地革命时期来看,革命经费问题在整体上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各地组织建设及其经济基础的差异,经费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各地在开源节流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也具有不均衡性。在问题突出的地方或时间,经费会给组织和革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晌。

首先是经费短缺影响组织关系。如在早期,经费本身不足,其分配更容易影响党团关系,中共九江县委书记华鄂阳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工作经历时,请求离赣留沪,“党团的关系,真是江西特有的现象……尤于经济的关系,时常发生党团的纠纷”^②。影响党团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的分配问题。党组织认为,团组织应该在经费问题上自谋出路,而团组织则要求到各机关提款,甚至主张党组织与团组织应该平分中央拨给的经费。后来,大家开会讨论,把团的经费作为党开支的一部分,党也必须给团必要的办公费,这才缓解了党团的经济矛盾^③。在苏区时期,经费甚至影响到县委与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矛盾,“苏维埃与党对立亦有,如兴国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县委去要钱。他要查县委的账,说你们又用去了”^④。

就上下级党组织关系而言,经费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消耗了组织沟通的大量精力。省委给地方党组织的拨款,通常取决于中央给省委的经费支持。从各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来看,中央给各个省的拨款彼此之间相差甚多。如 1927 年 10 月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就抱怨,

本省获得的中央拨款还不到中央拨给江苏经费的十分之一,后者是 1 万多经费^⑤。根据笔者统计,对比之下,江西从中央获得的经费还少于浙江。1928 年 12 月,江西省委在致中央的信中抱怨中央忽视江西工作,不发经费,不派人员,甚至表示:“中央如不要这块地盘,则请取消其组织好了,何必要那块招牌呢。”^⑥在省委抱怨中央的同时,江西各地党组织对省委有时也怨声载道,如“最近各地党部要钱要人的信纷至沓来,大有‘无钱无人万事休’之势”^⑦。上级对下级在经济方面支持不够,势必导致上级权威受损、号召力受限,甚至产生个人情绪影响组织工作。譬如“前湘赣边特书记邓××同志,因边特工作困难……故邓不愿再在边特工作,固此不经适省委即直接到沪”^⑧。

其次是江西省委为了“经济独立”,缩减组织和人员,这容易导致信息泄露,机关被破获,人员被捕。如 1927 年 10 月在南昌的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开始决定迁往九江。后来由于经费短缺等各种原因,加上机关北迁需要钱款,即使当时南昌能活动的人员仅三四人,连交通和技术书记都难以找到,省委依然决定留在南昌^⑨。人员缺乏,省委“自己兼做交通工作……总是带许多文件在街上跑”,导致信息泄露,机关被破获,人员被捕^⑩。因为经费短缺,必要的组织建设难以进行。如省委原计划筹备东特委,因人力财力缺乏,一直未成立^⑪。减少机关,大量人员合住或借住在群众家里,保密性差。“机关建筑的不适当——景镇党的机关,都是建筑在同志家中或非同志的店内。”^⑫过度缩减组织,既容易导致组织信息泄露,又使得省委与各地方组织之间互相隔绝^⑬。如 1929 年 7 月,中共赣西特委只有 1 人负责技术工作,时常连一些通告、通讯都无法完成^⑭。这些都容易影响党组

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1 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33 页。

③《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106 页。

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7 页。

⑤《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浙江新华印刷厂 1986 年印,第 204 页。

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6 年印,第 315 页。

⑦《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7 年印,第 42 页。

⑧《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7 年印,第 234 页。

⑨《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6 年印,第 52—53 页。

⑩《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59 页。

⑪《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6 年印,第 59 页。

⑫《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76 页。

⑬《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60 页。

⑭《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1988 年印,第 29 页。

织的正常运行和组织之间的顺利沟通。

最后是经济贪污及经费使用不当的现象时有发生,削弱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据团江西省委1927年12月的一份通告,在土地革命前的团组织中,各级领导机关多有贪污行为^①。土地革命时,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党组织,如党员干部以欺诈的方式骗取经费,“徐同志屡次以欺骗手段来瞒县委,如给钱租房子,房子不租,钱又扯用了,如说在乡村有亲戚,不建设油印机关”^②。1930年,赣西南地区甚至出现“腐化”现象,“党的观念不强的同志常以为革命打土豪是解决个人问题。一般同志在较好的环境生活特别表示腐化,金圈子、金戒子带起;还有藉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造成党内新土豪新劣绅”^③。应该看到,这类贪污浪费现象的记载主要见于上级党组织或巡视员的

报告,后者意在通过指出问题和批评来督促地方工作,却呈现了组织运行中经费问题的另一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经费在党组织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行文至此,笔者还想指出,本文的目的不只是论述江西党组织应对经费问题的历史,也想从经费角度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借用学者的话,党组织的经费困窘情形是“发生”的,而非“制造”的,是革命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并非革命者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程来看,面对革命经费拮据这道难题,共产党并未退缩,而是选择直面和应对,努力开源节流,并凭借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与建设,最终成功克服了这个挑战,使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现实。

On the CPC Jiangxi Local Organizations in Handling Problems of Funding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Period

DAI Lizhao & LI Shim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financial support. Insufficient funding had been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PC organizat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increase in financial expenses, coupled with the cutback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ppropriation,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often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funds. In fact,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Jiangxi took many measures to try to open up new sources of income and cut down on expenses. On the one hand, the specific ways or channels to explore sources of funding were through the fight for funding,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arty members, party fe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of fund-raising, personal self-funding.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pecific ways to save money from all sides had been taken, such as the streamlining of the organization, reduction of the meeting expenses, control of local budgets, curbing wastefulness and embezzlement. These measures generally helped t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Key words: the CPC Jiangxi local organization; revolutionary funding; open up new sources; cut expenditures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印,第105页。

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55—56页。

③《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印,第133页。

④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